

日本內閣文庫所藏《熊龍峰四種小說》考論

黃冬柏*

摘 要

明代的出版文化，隨著經濟的繁榮、技術的進步和市場的需求，得到了飛躍的發展。無論是刊刻機關還是流通地區，其數量和規模都超越了宋元，呈現出空前的繁盛。福建建陽，從宋代起就以中國重要的書籍刊行地區而聞名於世。到了明代，建陽的出版業更是迎來了繁盛期，從刊刻到販賣極為盛行。建陽刊刻的書籍不僅遍佈中國全境，而且流傳到了海外，其中有不少就流傳到了日本。

日本內閣文庫所藏中國古籍中不乏天下孤本、善本，而《熊龍峰四種小說》為其中之一。《熊龍峰四種小說》是指〈張生彩鸞燈傳〉、〈蘇長公章臺柳傳〉、〈馮伯玉風月相思小說〉、〈孔淑芳雙魚扇墜傳〉。在中國本土已佚的這四種小說的版式和紙質相同，而〈張生彩鸞燈傳〉首頁有“熊龍峰刊行”，再參照熊龍峰所刻其他小說、戲曲作品的年代，可以推定這四種小說都為建陽刻書家熊龍峰在明代萬曆期間所刊刻的。

拙稿在概括明代福建建陽的商業出版——“坊刻”的發展狀況之後，把焦點聚集在熊龍峰的刻書活動中，並通過對內閣文庫所收藏的《熊龍峰四種小說》進行具體的考察和分析，來闡明四種小說形式和內容的特徵，進而探討這些小說對中國話本小說的流傳和發展所起的作用。

關鍵詞：熊龍峰、四種小說、內閣文庫、話本、出版

本文收稿日期：2011/04/29 通過審查日期：2011/06/29

*日本九州共立大學經濟系副教授

一、前言

隨著經濟的繁榮、技術的進步和市場的需要，明代的出版文化得到了飛躍的發展，其刊行機關之多和流通地區之廣，都超越了宋、元時期，呈現出空前的繁榮。而福建建陽，從宋代起就以中國重要的書籍刊行地區而聞名於世。對此，清·葉德輝（1864-1927）在其所著《書林清話》中指出：

自宋至明六百年間，建陽書林擅天下之富，使有史家好事，當援貨殖傳之例增書林傳矣。¹

此處的“書林”為書坊、書店之意。建陽書林從宋至明書籍銷量為全國之首。尤其是到了明代，建陽的出版業迎來了繁盛期，從刊刻到販賣極為盛行。明·胡應麟（1551-1602）作了如下記載：

凡刻之地有三，吳也，越也，閩也。……其精，吳為最。其多，閩為最。越皆次之。其值重，吳為最。其值輕，閩為最。越皆次之。²

明代形成了三大刊刻中心，即以金陵（南京）為中心的吳，以杭州為中心的越，和以建陽為中心的閩。據上述胡應麟的記載可知，刊印精美而價格昂貴的為吳，價格低廉而流通廣泛的為閩，即建陽的刊行書籍。另外，據《建陽縣志》記載，在“崇化里”每月定期舉辦“書市”，即販賣書籍的集散市場，來自全國各地的書商集聚一堂，熱鬧喧嘩，建陽刊刻的書籍不僅遍佈中國全土，而且還流傳到了海外。³如此繁榮的建陽刊本在通俗文藝的領域也同樣，據統計萬曆期間（1573-1619）刊行的 120 餘種小說之中，多半為建陽的刊刻本。⁴而其中有不少流傳到了日本，現收藏於國立公文書館內閣文庫。

拙稿在概觀明代建陽商業出版——“坊刻”的狀況之後，把焦點聚集在熊龍峰的刻書活動中，並通過對日本內閣文庫所收藏《熊龍峰四種小說》的具體考察和分析，來闡明四

¹ [清]葉德輝：《書林清話》（北京：古籍出版社，1957）卷3〈明人私刻坊刻書〉，頁142。

² [明]胡應麟：《少室山房筆叢》（北京：中華書局，1958）卷4〈經籍會通〉，頁56。

³ 《嘉靖建陽縣志》（《天一閣藏明代方志選刊》所收，上海古籍書店，1982）：“書市在崇化里，比屋皆鬻書籍，天下客商販者如織，每月以一、六集。……書坊街在崇化里。”（卷3〈封域志·鄉市〉，頁6）。
“建陽版本書籍，行於四方者無遠不至。”（卷6〈藝文志·建陽縣學藏書記〉，頁14）。

⁴ 徐曉望：“現知萬曆年間出版小說共有 120 種，其中建陽書坊版約占一半，其餘金陵、杭州、成都、北京等大城市合起來才占了一半。”（北京：《出版史研究》第4輯〈建陽書坊與明代小說出版業〉，1996年）

種小說形式和內容的特徵、以及在話本小說的流傳和發展中所起的作用。

二、建陽坊刻和熊氏家族

中國古代出版，可分為由宮廷主導、主要刊佈政令典籍等的“官刻”，被視為以個人為主體、注重趣味修養的“家刻”，以及商業出版的“坊刻”三大系統。以商品形式出售、以贏利為目的的“坊刻”，由於和市場緊密相聯而充分反映讀者的需要，是探尋當時的社會風習和讀者嗜好的重要資料。代表明代“坊刻”的是福建建陽。建陽的刊刻業始於宋代，到了明代則擴大了規模、完備了體制。以名門余氏、劉氏所經營的雙峰堂、日新堂等為中心的著名書林，對出版文化的發展起了巨大的推動作用。在建陽書林中，與宋元以來的刊刻名門余氏、劉氏等不同，熊氏一族進入明代才參與刊刻業，因此有關熊氏的史料極少。據《建陽縣志》記載，熊氏始祖熊秘奉職於長安唐朝政府，為躲避黃巢之亂先移住江西南昌，而後定居於建陽。到了明代，第十九代子孫熊宗立作為熊氏一族開始投身於刻書活動。⁵ 繆詠禾所著的《明代出版史稿》中，熊宗立和熊大木作為明代著名書坊“種德堂”和“忠正堂”的主人有如下的記述。

熊宗立（1409-1482），字道宗，號道軒，又號勿聽子。……他刻印的書稱“中和堂”、“種德堂”。⁶

熊大木（1471-1576），號鍾谷，又稱鰲峰後人。……熊大木刻書稱“忠正堂”，博學多才，精於史學，能用演義體編撰小說。⁷

上述的熊大木生卒年為（1471-1576），不知來源何處？熊大木居然能活到105歲，令人質疑。況且熊大木作為通俗小說的編撰者確實是極為有名的，但如下列所示，查其所編之書，並沒有以“忠正堂”之名刊刻的。

◎楊氏（先春）清白堂刊本、新刊大宋中興通俗演義八卷 附精忠錄三卷

嘉靖壬子（三十一年・1552）、半葉11行、行22字、圖像14葉。題雲“鰲

⁵ 《建陽縣志》：“熊衰父秘避黃巢亂，乃自南昌徙建陽即義寧山下住焉。”（卷11第31條〈孝友傳〉《中國方志叢書・華南地方》，臺北：成文出版社，1975年，第237號收錄）《嘉靖建陽縣志》：“熊衰，崇泰里人，事親至孝。忽三日驟雨，本家園地銅錢皆滿。惟熊氏所得者堪用，其隣裡僕隸所得悉化為土，因號衰為兩錢翁。累世子孫文科武舉，恩榜奏蔭者凡一十二人，所居之地號曰熊墩。”（卷11〈列傳・人物類〉，頁3）。

⁶ 繆詠禾：《明代出版史稿》（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0）第14章〈明代出版人物〉，頁482。

⁷ 同前註，頁527。

峰熊大木編輯”、“書林清白堂刊行”、卷1第1行題“新刊大宋演義中興英烈傳”。其他7卷題“新刊大宋中興通俗演義”。首葉有嘉靖壬子自序、後署“建邑書林熊大木鍾谷識”。附精忠錄3卷、日本內閣文庫所藏。

◎余氏（象斗）雙峰堂刊本、新刊大宋中興通俗演義八卷 附精忠錄二卷
萬曆間刊本、半葉13行、行26字、每卷題“鰲峰熊大木編輯”、“書林雙峯堂刊行”、卷7題“書林萬卷樓刊行”、首葉有嘉靖壬子自序、後署“建邑書林熊大木鍾谷識”。附精忠錄2卷、日本內閣文庫所藏。

◎楊氏（江）清江堂刊本、新刊參采史鑑唐書志傳通俗演義八卷
嘉靖癸丑（三十二年・1553）、半葉12行、行25字、無圖、署“鰲峰熊鍾谷編集”、首葉有嘉靖癸丑李大年序、卷8末題“嘉靖癸丑孟秋楊氏清江堂刊”、日本內閣文庫所藏。

◎余世騰克勤齋刊本、京本通俗演義按鑑全漢志傳十二卷
萬曆戊子（十六年・1588）、半葉14行、行22字、上圖下文。題“鰲峰後人熊鍾谷編次”、“書林文臺餘世騰梓”、日本蓬左文庫所藏。

◎余氏（象斗）三臺館刊本、全像按鑑南北兩宋志傳二十卷
萬曆、半葉13行、行23字、上圖下文。1卷至10卷為《南宋》、11卷至20卷為《北宋》、《南宋志傳》卷1首葉題“雲間陳繼儒編次”、“譚陽書林三臺館梓行”、卷首序雲“昔大本先生、建邑之博洽士也。……彙為一書、名曰《南北宋兩傳演義》”，“大本”疑為“大木”之誤、即熊大木。日本內閣文庫所藏。

◎唐氏世德堂刊本、全出像補訂參采史鑑南宋志傳通俗演義題評十卷
唐氏世德堂刊本、全出像補訂參采史鑑北宋志傳通俗演義題評十卷
萬曆、半葉12行、行24字、插圖。圖記刻工姓名曰“上元王少淮”、題“姑孰陳氏尺蠖齋評釋”、“繡谷唐氏世德堂校訂”、書林熊大木所編、日本內閣文庫所藏。

楊氏“清江堂”自元始刻書，至明嘉靖、萬曆間亦稱“清白堂”，致力於小說的刊行。“雙峯堂”、“三臺館”、“克勤齋”為余氏（象斗、世騰）的書坊名，萬曆十六年（1588）刊行的《京本通俗演義按鑑全漢志傳》，是已知余象斗刻書的最早刻本。日本內閣文庫所藏的《新刊大宋中興通俗演義》，據孫楷第的考察，“今所見明人演宋中興事者，以此書為最早。”⁸同為內閣文庫所收的《新刊參采史鑑唐書志傳通俗演義》，孫楷第曾斷定此

⁸ 孫楷第：《中國通俗小說書目》（北京：作家出版社，1957），卷2〈明清講史部〉，頁50。

作是以隋唐時代為題材的小說中最早的作品。⁹《京本通俗演義按鑑全漢志傳》為日本名古屋蓬左文庫所收藏，關於其刊刻者，〈西漢〉和〈東漢〉各6卷中，〈東漢〉末卷記有“清白堂楊氏梓行”，而其他各卷則題雲“書林文臺余世騰梓”、“鰲峯後人熊鍾谷編次”。

另外，據方彥壽的考證，由於熊大木號“鍾谷”和熊氏第二十二代孫熊福鎮的號相同，而且兩者生年也很近，所以可推定為同一人物。¹⁰而官桂銓則在〈《熊龍峰四種小說》是建陽刻本〉一文中質疑方彥壽，為何在考證“熊氏後人”時沒有提及熊龍峰。¹¹

拙稿所要考察的《熊龍峰四種小說》的刊刻者熊龍峰之所以沒被提及，筆者認為是由於從熊氏家譜到所有的有關資料都找不到熊龍峰蹤影的緣故。胡士瑩在《話本小說概論》中指出：

嘉靖壬子（三十一年，1552）楊氏清白堂本《武穆王演義》和嘉靖癸丑（三十二年，1553）楊氏清江堂本《唐書志傳通俗演義》都有建陽書林熊鍾谷（大木）的題名，且版式與此四種極相類，鍾谷又號鰲峰，似與龍峰為兄弟輩，知龍峰亦為書坊主人無疑。¹²

熊大木“似與龍峰為兄弟輩”的推斷不無道理，但在還沒有發現有關熊龍峰的確鑿史料的情況下，筆者認為也可以視熊大木和熊龍峰為同一人物。因為明代書坊時常變換書坊的名稱和主人的名字，而這種風習在建陽書坊之間更為顯著。例如，建陽最著名的刻書家余象斗的書坊名，就有雙峰堂和三臺館，而刊刻者名除了余象斗之外，還有余象烏、余文臺、余世騰、余元素、余君召、余仰止等，令人眼花繚亂、不知就裡。儘管書誌上有如此不同的署名，但實際上為同一書坊主。由此是否可以推斷，熊龍峰和熊大木也是同一人物的不同署名呢。為其他書坊編撰小說時用“熊大木”的筆名，而在自家“忠正堂”刻書時則稱“熊龍峰”。但這種推測畢竟也不能排除第三種可能性，即熊大木和熊龍峰既不是兄弟，也不是同一人。這還有待關於熊龍峰的確鑿史料的發現而再作進一步的考察。現參考《日本東京所見小說書目》（孫楷第，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58年）、《全明分省分縣刻書考·福建省卷》（杜信孚、杜同書，北京：綫裝書局，2001年）等有關書目，把

⁹ 孫楷第：“今所見諸本，以此本為最早。”《日本東京所見小說書目》（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卷3〈明清部二〉，頁33。

¹⁰ 方彥壽〈明代刻書家熊宗立述考〉：“熊大木，查遍宗譜不見其名。疑即熊宗立的曾孫熊福鎮。譜云：‘（二十二世）福鎮，天育公四子（按：應為五子），位福四，行甲三，號鍾谷。……’此號為鍾谷的熊福鎮和號鍾谷的熊大木應即同一人。”（北京：《文獻》，1987年第1期）

¹¹ 官桂銓〈《熊龍峰四種小說》是建陽刻本〉：“方彥壽〈明代刻書家熊宗立述考〉中‘熊氏後人’一節沒有熊龍峰，不知何故。”（北京：《文獻》，1989年第3期）

¹² 胡士瑩：《話本小說概論》（北京：中華書局，1980）第13章〈明代話本的著錄和敘錄〉，頁496。

熊龍峰刊行的主要書目簡要歸納如下：

◎熊龍峰忠正堂刊本、張生彩鸞燈傳

萬曆間刊本、半葉 7 行、行 16 字、無圖、題雲“熊龍峰刊行”。日本內閣文庫所藏。

◎熊龍峰忠正堂刊本、蘇長公章臺柳傳

萬曆間刊本、半葉 7 行、行 16 字、無圖。日本內閣文庫所藏。

◎熊龍峰忠正堂刊本、馮伯玉風月相思小說

萬曆間刊本、半葉 7 行、行 16 字、無圖。日本內閣文庫所藏。

◎熊龍峰忠正堂刊本、孔淑芳雙魚扇墜傳

萬曆間刊本、半葉 7 行、行 16 字、插圖 3 半葉（3 幅）、圖嵌文中。日本內閣文庫所藏。

◎熊龍峰忠正堂刊本、重刻元本題評音釋西廂記二卷 附會真記等八種

萬曆壬辰（二十年・1592）、半葉 10 行、行 20 字、科白小字雙行、插圖 23 半葉（23 幅）。正文首葉題“重刻元本題評音釋西廂記卷上、上饒余瀘東校正、書林熊龍峰繡梓”、卷末署“萬曆壬辰歲孟春月、忠正堂熊龍峰梓行”。日本內閣文庫・東北大學附屬圖書館所藏。

◎熊龍峰忠正堂刊本、新鐫音釋評林演義合相三國史傳二十卷

萬曆三十一年（1603）、上圖下文。日本滋賀縣大津市叡山文庫所藏。

◎熊龍峰忠正堂刊本、新刊出像天妃濟世出身傳二卷三十二回

萬曆間刊本、上圖下文、明吳還初撰。卷末署“萬曆新春之歲忠正堂熊氏龍峰行”。

◎熊龍峰忠正堂刊本、新刻皇明草對一卷 萬曆間刊本。明李廷械撰。

◎熊龍峰忠正堂刊本、新鐫楊狀元匯選藝林伐山四卷 萬曆間刊本。明楊慎撰。

三、關於《熊龍峰四種小說》

《熊龍峰四種小說》是指日本內閣文庫所收藏的〈張生彩鸞燈傳〉〈蘇長公章臺柳傳〉〈馮伯玉風月相思小說〉〈孔淑芳雙魚扇墜傳〉四種小說。眾所周知，日本內閣文庫所藏中國古籍甚為豐富，其中不乏天下孤本、善本，而在中國本土已佚的這四種小說，也正為孤本。關於這四種小說，日本書誌學者長沢規矩也早已指出：

內閣文庫第二部漢籍目錄中也能看到的〈馮伯玉風月相思小說〉〈孔淑芳雙魚扇墜傳〉〈蘇長公章臺柳傳〉〈張生彩鸞燈傳〉四冊，惟〈孔淑芳雙魚扇墜傳〉有一頁大的插圖外，板式和紙質四冊都相同，四周雙邊，有界，每半葉七行，每行十六字，框郭內縱六寸二分乃至五分，橫三寸七八分，略字很多。各冊分量都甚少，或可視為一叢書的分冊。由於是在同一時代、由同一書肆出版的同一種類的書，所以具有如此類似的形式。〈張生彩鸞燈傳〉首頁有“熊龍峰刊行”，從板式來看可視為萬曆期間的俗書。¹³

由此可見，四冊都為同一版式和紙質，是在同時代由同一書肆刊行的同一種類的書，而〈張生彩鸞燈傳〉首頁有“熊龍峰刊行”，所以可推定這四種小說都為建陽刻書家熊龍峰在明代萬曆期間所刊行的。筆者有幸親見原藏，發現長沢規矩也提及的〈孔淑芳雙魚扇墜傳〉“一頁大的插圖”，實際上分為三部分的半葉，即第二葉裏・第七葉表和第十二葉表。而〈孔淑芳雙魚扇墜傳〉頁數注為“二十七葉”，事實上只有十七葉，這大概是單純的筆誤。

中國大陸學者王古魯先生早年在日本訪書時，曾拍攝此四種小說照片，後經本人校注由古典文學出版社（上海）於一九五八年出版排印本，一九八七年上海古籍出版社重印。此外，上海古籍出版社《古本小說集成》和臺灣天一出版社《明清善本小說叢刊》也均影印收入，故這一海外孤本現已頗為流行易得。

《熊龍峰四種小說》的內容，為明代廣為流傳的戀愛故事。在中國古典小說的發展歷史上，從唐代《鶯鶯傳》始，在文人士大夫中誕生了才子佳人小說。而進入宋代之後，小說創作和傳播的社會環境都發生了巨大的變化，戀愛故事也從文人士大夫的沙龍擴展到了民間說唱文藝的新天地。宋人羅燁所著的《醉翁談錄》甲集卷一〈小說開闢〉中，記載了八類部門共一百零七種的話本演目。其第三類為〈傳奇〉，錄有十八種以男女戀愛為題材的演目。此處所謂的〈傳奇〉，是指在宋代城市的娛樂場所中深受歡迎的說唱故事“說話”中，以戀愛為主題的節目。在此，以《熊龍峰四種小說》為中心，對照《太平廣記》《綠窗新話》《醉翁談錄》《寶文堂書目》《六十家小說》以及《古今小說》《剪燈新話》，把各個故事系統整理列表如下：

¹³ 〔日〕長沢規矩也：〈「清平山堂」「熊龍峯」刊行の話本に就いて〉（《長沢規矩也著作集》第1卷收錄，東京：汲古書院，1882，頁150，筆者譯）。

表(1)《熊龍峰四種小說》系統表

《太平廣記》《綠窗新話》《醉翁談錄》《六十家小說》《寶文堂書目》《熊龍峰四種小說》				《古今小說》《剪燈新話》
鴛鴦燈		彩鸞燈記	張生彩鸞燈傳	張舜美燈宵得麗女
柳氏傳	沙吒利奪韓翃妻	章臺柳	失記章臺柳	蘇長公章臺柳傳
		風月相思	風月相思	馮伯玉風月相思小說
		孔淑芳記	孔淑芳雙魚扇墜傳	滕穆醉遊聚景園記・牡丹燈記

上表之中,〈蘇長公章臺柳傳〉的基本情節是依據唐傳奇〈柳氏傳〉的,但主人公卻變成了蘇軾,設定為其在杭州在任中的故事。〈孔淑芳雙魚扇墜傳〉的前半部分和明・瞿佑(1341-1427)《剪燈新話》卷二〈滕穆醉遊聚景園記〉、後半部分和卷二〈牡丹燈記〉的內容基本相同。以下,探討《熊龍峰四種小說》的特徵、以及和其他話本小說的傳承關係,但由於篇幅的關係,無法涉及上表所收的全部作品,而就粗體字的、內容上有關聯的〈張生彩鸞燈傳〉和〈張舜美燈宵得麗女〉、以及〈風月相思〉和〈馮伯玉風月相思小說〉兩組小說進行具體考察。

熊龍峰的〈張生彩鸞燈傳〉和馮夢龍編輯的《古今小說》中所收〈張舜美燈宵得麗女〉的相同場面進行比勘對照,列成下表。為論述簡便,〈張生彩鸞燈傳〉簡稱為〈熊本〉、〈張舜美燈宵得麗女〉簡稱為〈馮本〉。

表(2)〈張生彩鸞燈傳〉和〈張舜美燈宵得麗女〉比勘表¹⁴

	〈張生彩鸞燈傳〉(《熊龍峰四種小說》)	〈張舜美燈宵得麗女〉(《古今小說》卷23)
(1)	入話……。 (七言絕句一首)	……。 (七言絕句一首)
(2)	乃誦詩一律,或先或後,近車吟詠云: <u>何人遺下一紅綃,暗遣吟懷意氣饒。</u> <u>勒馬住時金革登脫,極身親用寶燈挑。</u> <u>輕々滴々深々韻,慢々尋々緊々瞧。</u> <u>料想佳人初失去,幾回纖手摸裙腰。</u> 車中女子,聞生吟諷,…… (下線部分:七言律詩)	乃誦詩一首,或先或後,近車吟詠云: <u>何人遺下一紅綃,暗遣吟懷意氣饒。</u> <u>料想佳人初失去,幾回纖手摸裙腰。</u> 車中女子,聞生吟諷,…… (下線部分:七言絕句)
(3)	生曰:“我非木石,豈肯獨生。”女曰: “君有此情,我之願也。”遂解衣帶共 結,與生同懸於梁間。 <u>尼急止之曰</u> :……	生曰:“我非木石,豈忍分離。但尋思無計。 若事發相連,不若與你懸梁同死,雙雙做風 流之鬼耳。”說罷,相抱悲泣。 <u>老尼從外</u> <u>來</u> ,……

¹⁴ 〈張生彩鸞燈傳〉據日本國立公文書館內閣文庫所藏原本照片。〈張舜美燈宵得麗女〉據《古本小說集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收錄內閣文庫藏影印本。

(4)	未知久後成得夫婦也不？ <u>且聽下回分解</u> 。 <u>正是</u> ：……	未知久後成得夫婦也不？且聽下回分解。正是：……
(5)	那女子生得如何？ <u>鳳髻鋪雲，蛾眉掃月。一面咲共春光鬪艷。雙眸溜與秋水爭明。……</u> 這舜美一見了那女子，…… (下線部分：119 字)	那女子生得 <u>鳳髻鋪雲，蛾眉掃月。生成媚態，出色嬌姿。</u> 舜美一見了那女子，…… (下線部分：16 字)
(6)	做子弟的牢記在心，勿忘了調光經。怎見調光經法： <u>冷笑佯言，粧癡倚醉。屈身下氣，俯就承迎。……</u> 說那女娘子被舜美撩弄，……(下線部分：438 字)	做子弟的，聽我把調光經表白幾句： <u>雅容賣俏，鮮服誇豪。遠觀近觀，只在雙眸傳遞。……</u> 說那女子被舜美撩弄，…… (下線部分：120 字)
(7)	遂迎迓到於房中，舜美躬身言曰：“僕乃途路之人，……。”	遂迎迓到於房中， <u>吹滅銀燈，解衣就枕。……</u> <u>兩箇嬉歡已罷，</u> 舜美曰：“僕乃途路之人，……。”(下線部分：121 字)
(8)	<u>正所謂</u> ：……。話本說徹， <u>權作散場</u> 。	有詩爲證：……。

小說的內容是私奔途中不幸走散的男女情人，三年後再會而喜結良緣。這是明代極爲典型的才子佳人故事，在話本這一文體中，儘管是同一故事，但由於創作時期的不同，表現形式以及內容等都會相應地產生變化。從以上比勘表中可以看到，〈熊本〉爲舊體裁，從說話人的腳本至鈐刻刊行並未作什麼添改。相比之下，〈馮本〉在採錄過程中則對原本作了明顯的增添改訂。具體來看，〈熊本〉卷首的(1)“入話”二字、文中的(4)“且聽下回分解”、“正是”、末尾的(8)“正所謂”以及“話本說徹，權作散場”等表現，都保留了原始話本體的基本特徵。此外，〈熊本〉和〈馮本〉都收錄了同樣內容的韻文，但在字數上則〈馮本〉有明顯刪減的傾向。(2)所引的下線部分〈熊本〉爲七言律詩，而〈馮本〉則刪除其中四句，變成了七言絕句。(5)是描寫女主人公美貌的一大段韻文，〈熊本〉中的對句部分被大量刪減，從 119 字減爲 16 字。(6)〈熊本〉中 438 字的冗長的《調光經》和其後的對句，至〈馮本〉則僅剩 120 字。從早期話本中供說話人演唱的韻文較多這一現象中可以推測，口頭文學在向案頭文學演進變化的過程中，失去演唱功能的悅耳動聽的韻文被逐漸刪減。而作爲話本的慣用句“入話”“且聽下回分解”“正是”“正所謂”“話本說徹，權作散場”等當然也成了削除的對象。上述這些腳本慣用句和不少韻文還完整地保存在〈熊本〉中，由此可以斷定〈熊本〉是並未改變說話人原本形態的、早期的話本小說。

另一方面，從內容上也能看到不少的改變。例如(3)〈熊本〉中記述男女主人公欲懸

樑殉情時，“尼急止之”。這容易使人產生兩人在情交時尼姑也一直陪伴在場的誤解。而到了〈馮本〉中，則改寫成“老尼從外來”，較為通情合理。還有〈7〉〈馮本〉花費 121 字露骨地描寫男女主人公交歡的場面，這使人聯想到同時期誕生的長篇小說《金瓶梅》中同樣的色情描寫。由於說唱文學是在公眾的場合通過聲音來表達的，這種色情場面的表述，難免使人躊躇尷尬。但到了案頭作品中，作者可以適應當時社會風俗和讀者嗜好而大膽地進行改變和創作。

綜上所述，話本小說原為在宋代的娛樂場所流行的說唱人的腳本，在向案頭文學的發展演變過程中，本來為演唱部分的韻文被逐漸減除的同時，為迎合讀者的嗜好而增添了各種各樣的情節、包括色情場面等。尤其是嘉靖・萬曆期間的小說中，凝聚了刊刻、編輯者的苦心，產生了變化萬端、豐富多彩的作品。

《六十家小說》作為現存最古的話本小說集，在中國小說史佔有重要地位。據馬廉的考證，這六十篇小說是嘉靖二十年至三十年（1541-1551）期間由洪楸的清平山堂出版的。¹⁵ 現存二十九篇中，有十五篇被收藏在日本內閣文庫。另一方面，關於《熊龍峰四種小說》的刊行時期，孫楷第推定為萬曆期間，¹⁶這從熊龍峰忠正堂的刻書活動來看是極為妥當的。而《六十家小說》和《熊龍峰四種小說》是如何的關係？熊龍峰〈馮伯玉風月相思小說〉在《六十家小說》中以〈風月相思〉的題名也被收錄。當《六十家小說》在中國大陸以《清平山堂話本》出版活字本時，校注者譚正璧以“惜國內已無傳本”為由沒作為校勘的對象。¹⁷以下，比勘〈風月相思〉和〈馮伯玉風月相思小說〉的異同而整理成表（3），以此來探尋兩者的因承關係。為論述簡便，〈風月相思〉簡稱為〈洪本〉、〈馮伯玉風月相思小說〉簡稱為〈熊本〉。

表（3）〈風月相思〉和〈馮伯玉風月相思小說〉異同表¹⁸

	〈風月相思〉（《六十家小說》）	〈馮伯玉風月相思小說〉（《熊龍峰四種小說》）
(1)	與世罕有	壘世罕有
(2)	逐賦一詩以呈師	遂賦一詩以呈師
(3)	白日豺狼當路道，黃昏烽火起邊樓	白日豺狼當道路，黃昏烽火起邊樓

¹⁵ 馬廉：“今輒因其內容話本系統之小說居多，名曰清平山堂話本。刊刻年月，以洪刻他書序注系者證之，當在嘉靖二十年至三十年間（1541-1551）。”（譚正璧校點《清平山堂話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附錄2〈清平山堂話本序目〉，頁188）。《馬隅卿小說戲曲論集》（北京：中華書局，2006）也收錄。

¹⁶ 孫楷第：“此明坊刊本小說四種，……知皆熊龍峰一人所刻。余所見龍峰刊書，尚有余瀘東校《重刊元本題評音釋西廂記》，封面題‘忠正堂熊龍峰鑄’，書刻在萬曆十八年二十年頃。則此亦萬曆間所刊耳。”同註9，頁7。

¹⁷ 譚正璧：“本篇又有萬曆時熊龍峰刊本，名馮伯玉風月相思小說。惜國內已無傳本。國色天香卷八上層有相思記，亦即此篇，今取以比勘。”同註15，頁94。

¹⁸ 〈風月相思〉據《古本小說集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收錄內閣文庫藏影印本《清平山堂話本》。

(4)	特以示或	持以示或
(5)	遂令入閨閣	遂令入閨閣
(6)	千重蜜葉苦相屏	千重蜜葉苦相屏
(7)	巧畫蛾眉爲阿誰	巧畫蛾眉爲阿誰
(8)	金蓮微動玉鈎搖	金蓮微動玉鈎搖
(9)	謝鯤從折機邊齒	謝鯤徒折機邊齒
(10)	蛾眉掃月	蛾眉掃月
(11)	知此時若心動也	知此時若心動也
(12)	彼時以我病癒	彼特以我病癒
(13)	吟琴折齒	鼓琴折齒
(14)	夫人即與公曰	夫人即語公曰
(15)	此意千載難買，息和愛	此意千金難買，恩和愛
(16)	瓊意衣肖解	瓊意稍解
(17)	翌日，公令人探生，曰：“投託門下，多蒙厚恩，敢効結草之意，既蒙有命，安敢不從。”退以告公。	翌日，公令人探生，生曰：“投託門下，多蒙厚恩，敢効結草之意，既蒙有命，安敢不從。”人以生言告公。
(18)	春透花枝，一□□□□時，相憐相愛。	春透花枝，一日偃倚十二時，相憐相愛。
(19)	瓊曰：“豈必書也。自生別後，有詩十餘首，併錄寄贈，以見我之心耳。”…… 淚雨潸々灑滿衣，含愁強賦斷腸詩。 自從昔日相分手，直至今朝懶畫眉。 東閣尚懷揮翰墨，西園猶想折花枝。 自君一去無消息，獨對青銅怨別離。	瓊曰：“然自生別後，有詩十餘首，錄之寄贈，以見我之心耳。”…… 其一 淚雨潸々灑滿衣，含愁強賦斷腸詩。 自從昔日相分手，直至今朝懶畫眉。 東閣尚懷揮翰墨，西園猶想折花枝。 自君一去無消息，獨對青銅怨別離。 其二 景物鮮妍在上林，水山玉樹占朝陰。 鳴蟬樹底愁人巧，蟋蟀塔前動客心。 泣別最嫌金魄冷，悲離不勝彩衣砧。 夢魂幾渡瀟湘水，空惹斑々淚雨淋。 …… 其十 無端鎖日鎖雙蛾，縷々愁來似疊波。 閑數落花消積恨，坐牽蕉葉減情魔。 堪嗟好事成還敗，深憾佳期別更多。 拂鬢自憐尤自嘆，馮生負我奈之何。
(20)	天顏大悅，謂宋景曰：“……皆卿薦舉得其人也。”景稽首拜曰：“愚臣無知之明敏果斷，舉選得人。”	天顏大喜，謂宋景曰：“……皆卿薦其人也。”景稽首拜曰：“愚臣無知人之明，皆陛下用人之明也。”

以上只列出了一部分的異同，但從這些例文中已能窺見兩小說的差異。首先，從（1）至（16）都是〈洪本〉的錯字，在〈熊本〉中被訂正。（17）的會話部分，〈洪本〉由於沒有明確說話者是誰，使得對話混淆不明。〈熊本〉分別加了“生”和“人”表明說話人，文意則變得明瞭。（18）〈洪本〉所缺的五字在〈熊本〉中保存完好。（19）〈洪本〉中儘管

有“有詩十餘首，併錄寄贈”的記述，但實際上只載有一首詩。而〈熊本〉中十首詩則收錄齊全。(20)〈洪本〉的下線部分意思難以理解，而再讀〈熊本〉則文意通暢清晰。

根據上述異同，應該如何判斷〈熊本〉和〈洪本〉的版本性格和特徵呢？日本學者中裡見敬在比較了〈熊本〉和〈洪本〉的異同後，認為兩者“除了細微的文字差異之外完全一致。”，進而得出了從刊行年代來看〈熊本〉是根據〈洪本〉而刻成的版本這一結論。¹⁹但是，從〈洪本〉所缺九首詩在〈熊本〉中被完整收載等事實來看，很難簡單的概括為兩版本是單純的先後繼承關係。筆者認為，〈熊本〉恐怕並不是根據〈洪本〉而是依據另外的版本刊刻的，或者〈熊本〉和〈洪本〉是據同一祖本刊刻，而〈熊本〉比〈洪本〉更準確地流傳至今。簡言之，〈熊本〉和「洪本」之間沒有直接的承襲關係。不管怎麼說，《熊龍峰四種小說》和《六十家小說》儘管有數量多寡之分，但作為早期話本小說同樣應該給予高度的評價。

四、結語

《熊龍峰四種小說》是何時創作的？而熊龍峰又是何時刊刻的？這些問題還有待具體探討。《熊龍峰四種小說》在嘉靖（1522-1566）期間的《寶文堂書目》中都有記載，因此可以斷定為明·嘉靖以前創作的作品，但不能說都是宋代的話本。因為從表現形式到言語風格等都有明顯的差異。作為具體確定哪一作品是宋代話本的方法，胡士瑩提出的八條推敲方法，是極富啟發性的。²⁰如上所述，〈張生彩鸞燈傳〉和〈蘇長公章臺柳傳〉分別以〈鴛鴦燈〉和〈章臺柳〉的題名被記載在宋代《醉翁談錄》中，如果單從故事內容相同就立即得出這些是宋代的話本小說的結論，那還為時過早。有必要從故事內容、表現形式、語言風格、社會風習、時代背景等方面進行綜合的判斷。從上述考察可以看到，〈張生彩鸞燈傳〉為舊體裁、對話本原本沒作什麼添加而刊刻。〈蘇長公章臺柳傳〉也同樣具有顯著的原始話本的表現特徵。因此這兩部作品可以斷定為早期（宋元）的話本。而另一方面，〈馮伯玉風月相思小說〉是用文言、並且比嘉靖期間刊刻的《六十家小說》和萬曆十五年（1587）刊行的通俗叢書《國色天香》中〈風月相思〉的表現更加纖細秀麗，因此不太可能為宋元時代的話本小說。〈孔淑芳雙魚扇墜傳〉由於起首有“話說弘治年間（1488-1505）”，再加上在內容和表現上和瞿佑《剪燈新話》極為類似，因此可推斷為

¹⁹ 中裡見敬：“試比較對照兩者，除了細微的文字差異之外完全一致。……從這一事實可以推定，熊龍峰刊行的小說是根據《六十家小說》而刊刻的。”（東京：《東方學》第85輯〈清平山堂『六十家小說』をめぐって〉，1993年1月，後同氏《中国小説の物語論的研究》收錄，東京：汲古書院，1996年。筆者譯）

²⁰ 胡士瑩：《話本小說概論》（北京：中華書局，1980），第7章〈現存的宋人話本〉，頁196。

明代的擬話本作品。

由於篇幅的關係，有關〈蘇長公章臺柳傳〉和〈孔淑芳雙魚扇墜傳〉的內容和表現的具體特徵、以及《熊龍峰四種小說》的刊刻於萬曆何年等課題，有待另外撰稿再作詳細考察。從上述考論中可以看出，作為明代商業出版的“坊刻”，由於真實地反映了社會的風俗狀況和讀者的欣賞趣味，而具有重要的研究價值。拙稿通過對明代建陽“坊刻”狀況的概括和熊龍峰刻書活動的考察，以及對在內容上類似的〈張生彩鸞燈傳〉和〈張舜美燈宵得麗女〉、以及〈風月相思〉和〈馮伯玉風月相思小說〉兩組小說進行互相比勘，從而窺見了明末話本小說流傳和發展的一斑。

引用書目

一、傳統文獻

- 〔明〕胡應麟：〈經籍會通〉，《少室山房筆叢》，卷4，北京：中華書局，1958年，頁56。
- 〔清〕葉德輝：〈明人私刻坊刻書〉，《書林清話》，卷3，北京：古籍出版社，1957年，頁142。

二、近人論著

- 〔日〕中裡見敬：〈清平山堂『六十家小說』をめぐる〉，《中国小説の物語論的研究》，東京：汲古書院，1996年。
- 〔日〕長澤規矩也：〈「清平山堂」「熊龍峯」刊行の話本に就いて〉，《長澤規矩也著作集》，第1卷，東京：汲古書院，1882年。
- 方彥壽：〈明代刻書家熊宗立述考〉，《文獻》第1期（1987）。
- ：〈明代刻書家熊宗立述考〉，《文獻》第3期（1989）。
- 官桂銓：〈《熊龍峰四種小說》是建陽刻本〉，《文獻》第3期（1989）。
- 洪梗：〈風月相思〉，《古本小說集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
- 胡士瑩：〈現存的宋人話本〉，《話本小說概論》，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
- ：〈明代話本的著錄和敘錄〉，《話本小說概論》，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
- 孫楷第：〈明清講史部〉，《中國通俗小說書目》，北京：作家出版社，1957年。
- ：《日本東京所見小說書目》，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58年版與1981年版。
- 徐曉望：〈建陽書坊與明代小說出版業〉，《出版史研究》，北京：建陽書坊，1996年。
- 馬廉：《馬隅卿小說戲曲論集》，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
- 馮夢龍：〈張舜美燈宵得麗女〉，收於《古本小說集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
- 福建省政府：〈封域志·鄉市〉，收於《天一閣藏明代方志選刊》，卷3，頁6，上海：古籍書店，1982年。
- ：〈藝文志·建陽縣學藏書記〉，收於《天一閣藏明代方志選刊》，卷6，頁14，上海：古籍書店，1982年。
- ：《嘉靖建陽縣志》，收於《天一閣藏明代方志選刊》，卷11〈列傳·人物類〉，頁3，上海：古籍書店，1982年。
- ：《嘉靖建陽縣志》，收於《天一閣藏明代方志選刊》，上海：古籍書店，1982年。
- 編著單位不詳：《建陽縣志》，收於《中國方志叢書·華南地方》，第237號收錄，卷11第31條〈孝友傳〉，臺北：成文出版社，1975年。

繆詠禾：〈明代出版人物〉，《明代出版史稿》，第 14 章，頁 482，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0 年。

譚正璧校點：〈清平山堂話本序目〉，《清平山堂話本》，頁 188，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年。

On Xiong Longfeng's Four Novels (熊龍峯四種小說) in the Cabinet Book Collection of Japan

Huang Dongbai*

Abstract

Xiong Longfeng's Four Novels (熊龍峯四種小說) is one of the Chinese antiquarian books included in the Cabinet Book Collection owned by the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 The *Xiong Longfeng's Four Novels* consists of *The Biography of Zhang Sheng Cailuandeng* (張生彩鸞燈傳), *The Biography of Suchangong and Zhangtailiu* (蘇長公章臺柳傳), *Feng Boyu Fengyuxiangsi Novel* (馮伯玉風月相思小說), and *The Biography of Kong Shufang Shuangyushanzhui* (孔淑芳雙魚扇墜傳). These four novels have already been lost in the mainland of China, but their editorial styles and the quality of paper are quite the same. Moreover, as *The Biography of Zhang Sheng Cailuandeng* (張生彩鸞燈傳) is prefaced with the description of 'Published by Xiong Longfeng', the four novels are presumed to be published by *Xiong Longfeng* (熊龍峯) in Jianyang (建陽) in the Ming (明) dynasty.

In this paper, the publishing activity of *Xiong Longfeng* (熊龍峯) in *Jianyang* (建陽) in the Ming (明) dynasty is discussed. With the precise analysis of *Xiong Longfeng's Four Novels* (熊龍峯四種小說), their features of the editorial styles and the contents are clarified, and what contribution the novels made to develop and expand Chinese novels is considered.

Keywords : Xiong Longfeng (熊龍峯), Four Novels (四種小說), Cabinet Book Collection of Japan, Storytelling, Publications

*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Kyushu Kyoritsu University, Japan.